

网络文学符号重构的互文性“污染”

——《诗歌语言的革命》发表半个世纪后的符号图景

禹建湘¹, 张浩翔^{1,2}

(1.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12;
2. 利兹大学语言、文化与社会学院, 利兹, LS2 9JT)

摘要: 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发表半个世纪以来, 文本在符号的互动和流动中不断突破自身边界。随着互联网媒介发生迭代, 网络文学在更具开放性的文本场域中实现了符号的快速互动, 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诞生以来的无限符号图景也印证了文本的“污染”重构与互文关系。克里斯蒂娃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设想的互文性“污染”符号重构是一种与绝对权威性“纯洁”相对立的流动理念, 强调了文本中符号意义的对话。一方面, 基于文本符号重构的“污染”, 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内容输出和人类创作的差异性比较, 可以发现互文的流动是一种机械式重复的对话。机器语言符号的简单“拼接”是无法实现符号重构过程中的艺术美韵, 两种符号交互的模式会呈现出显著的美的差异。另一方面, 克里斯蒂娃也曾预见性地提出了“必要的重复”。这种必要性对网络文学创作中互文的艺术审美提供了可供参循的范式, 表明互动符号的文本之间并非是单向度的意义传递, 新旧文本的符号矩阵会形成对能指和所指的新关联, 从而在不同媒介中整体性的故事中产生新的文本符号意义, 进一步拓展了文本的边界。

关键词: 网络文学; 互文理论; 克里斯蒂娃; 符号学; 生成式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5-0194-11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颠覆了文学符号的所指固定性, 提出了“用代替互主体性的概念是互文(intertextualité), 诗意的文本语言读起来至少是‘双胞胎’”^{[1](146)}。随后, 这一理论在其导师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推动下逐渐发展成熟。克里斯蒂娃关注到了意义在文学创作驱动中的作用, 并将文学符号的位置和意义推向传统文本的边界之外, 打破了过往的语法并建构出了一个全新的符号秩序。《诗歌语言的革命》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 互文性理论在全球的影响力始终未曾消退。由于读者和作者个体“所能接触到的文本只是这个真实的广阔的文本世界的很小一部分, 很难完全实现她对互文性的构想”^[2],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也曾因此一度被认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框架。由于网络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更接近无限广阔空间的文本世界, 克里斯蒂娃在半个世纪以前所构想的符号网络也日益清晰, 这不仅表明了其理论设想契合和印证了当前无限开放符号场域的现实, 也更加凸显出其理论的前瞻性。

数字化媒介使得符号系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推动了网络文学文本图景中符号互动和意义流动的加速, 显示出互文的文本张力。而网络媒介不仅扩大了人类对符号世界的接触范围, 也使得互文

收稿日期: 2024-11-29; 修回日期: 2025-03-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网络文学跨媒介叙事研究”(23CZW061)

作者简介: 禹建湘, 男, 湖南双峰人, 文学博士,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学, 联系邮箱: yujianxiang24@csu.edu.cn; 张浩翔, 男, 新疆昌吉人,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利兹大学语言、文化与社会学院访问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网络文学

性符号交织、重构与生成的无限概念在网络媒介的多语态环境下转化为现实的体验。数字媒介符号体系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也使得网络文学进一步突破了传统文学的边界,将符号间的关系通过反复的引用、混合与重构,在不断互动的符号网络中实现了意义的转化与再创造。在克里斯蒂娃关于语言符号学的理论维度中,“意义的双重困境与污染(contamination)相类似,只要是重复的,就是意义之中的模仿”^{[3](19)},并以此作为其“理论未来能够成为可能性的基础性部分”^{[3](19)},进而带来语义与形式的无穷变动。克里斯蒂娃认为“符号是通过流动和标记表达”^{[4](40)},基于此可以认识到文本符号的重复和文本间的相互依赖与互动。这也意味着在文本的流动而形成的互文性理论下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自足的,而是具有异质性与开放性的。因此,文本之间的相互参照导致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使得任何文本都具有“污染”性的,也就是说任何文本都不是单一、纯净的,而是由许多文本镶嵌而成的。

克里斯蒂娃对文本符号流动的“污染”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影响。她在探讨符号和符号学问题时,借用了德里达关于符号和符号学的理解,阐释了“能够让我们设想一个异质性的功能”^{[4](41)}。在德里达关于语言污染和纯洁对比讨论的影响下,克里斯蒂娃将“污染”的另一面“纯洁”(purity)看成一个相对固定、标准化的结构或者语言形式,认为其并不包含多重意义或变动的空间,“没有任何理由将其(purity)称作是理智的、神圣的或者与其他类型协调的”^{[4](104)}。因此,在关于符号互动作为一种类似的“污染”态度上,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符号和意义固定性的质疑,强调语言文本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克里斯蒂娃则更关注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意义的生成,在她看来,“深层结构是一个定义很明确的层次,它要符合基本规则的短语结构,明确在合适的语境中插入词汇”^{[4](37)}。因此,关于互文性的“污染”理解不能局限于文本内容的关联和重复,将符号之间的互动等同于不同文本的符号复现。我们应当避免理解为单调的符号重复,从而造成对互文性的理解被简化为文本间的平面关联,将符号的交织和变化看作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机械的重复。克里斯蒂娃提出并不断完善发展互文性理论探索的过程,也始终是基于深层次意义的文本关系建构,而非简单的符号再现。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态,正以其独特的跨媒介、即时互动性和符号重构力不断改变着传统文学的疆界。特别是当以 Deepseek-R1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通过对海量文本的处理和分析,实现了长篇幅文本的输出可能,网络文学的符号流动也更加接近于全面触摸到广阔的文本世界。《机忆之地》和《天命使徒》等人工智能生成文本作品以更大体量的文本规模和更高速的文本互动过程进一步印证了克里斯蒂娃在半个世纪之前对符号的交互与无限重组,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生成新文本的设想,也更体现出其理论的前瞻性。因此,当网络文学在开放的数字媒介环境中实现了符号的重叠与交互,我们也得以从意义的流动带来文本“污染”的视角出发,在网络文本的内部结构以及文本与外部文化社会语境的持续互动中,阐释读者、作者、平台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共同参与文本海洋塑造过程的互文状态。由此,网络文学在开放互动的媒介场域中实现了文本的动态互动,打破了传统封闭的语言文化秩序。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文本生成速度与规模,通过海量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完成了对文本的快速拼接与重复性生成,给符号重构的无尽可能性带来了更多的想象,也使得文本成了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场。但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对现有符号进行简单重组的生成模式,并不能够在文化语境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只是对已有符号的大规模、高频率的机械重组,展现出其作为一种机器人和人类创作的本质性差异。这种简单的符号重复并非是互文理论追求的深层次意义“污染”,缺乏主体性的符号再现并无法实现互文的真正价值。因此,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推崇符号“污染”艺术的思想,其前瞻性不仅仅在于对庞大符号体系的文本重构可能的预见,更表现在她探索符号重复的过程也揭示了意义再生与文化张力的关键作用,推动了符号意义的深层次互动。

一、网络文学互文“污染”叙述秩序中的符号互动

网络文学在开放的数字化平台上发展,通过多样化的叙事实现符号的融合与渗透,不断打破既有的文学边界。无论是类型化网络文学创作还是网络文学的“IP”文化因子的创作,都反映出网络文学作者可以在创作中频繁引用、改编和混合其他作品的元素,形成跨文本的对话关系。这也意味着互文性的艺术表现并不等于重复的单调出现,而是一种状态化的艺术灵感获取。特别是随着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输出表现出“难以糅合历史、地方、习俗、生活等微妙的特质,因此导致了灵韵的消逝”^[5]和文学作品艺术性的缺位困境,文本符号的“拼凑”规则与“污染”秩序之间的审美差异也随之凸显。

克里斯蒂娃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将主体和身体驱动力的分离看作是语言秩序开启的唯一方式,并称之为“审美阶段(thetic phase)”^{[4](44)}。这也表明互文性的提出虽然是对符号学权威的超越,但是其捍卫的则是主体对诗性的追求和欲望的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库语料的解构和重构输出新的语言文本,但是这种内容生成模式表现出的市场化和高效化则与欲望驱动的审美理念背道而驰,也与互文性反叛实用和资本驱动下机械化的理念是相悖的。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依赖于大量现有文本数据的提取和重组,是一种规则化、程式化的生产模式,所以其输出的任何内容都是在预设的算法和模型中形成的,表现出的是作为符号的文本“拼凑”重复而非“污染”的艺术。事实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输出不仅不是对语言秩序的破坏,相反则更是对既有语言规则的绝对尊崇,是一种机械式的符号重构。最早人工智能文学创作的实验品(*I the Road*)就曾尝试再现公路小说经典元素,虽然能够通过公路文化的符号达到对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写作风格的成功模仿,但作品也难以呈现旅途孤独的情感表达,更多则表现出物的符号叠加模式。网络文学的叙事互文则不同于人工智能的“拼凑”式符号重复生成,在创作过程中不是简单遵循过往文学作品的叙事套路,而是将既有的文本符号和语言秩序作为一种呼应体现在文本之中。例如,《择天记》关于神石碑文等内容的情节设定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红楼梦》叙事的影响;故事发展推进过程中,主人公陈长生的命运也表现出对抗命运、爱情与责任冲突等相似于贾宝玉的人物品格。可见,这种传统文学作品中人物特质对网络文学形象建构的“污染”并不是简单的角色符号重复表现,而是将精神气质的“灵韵”文本融入主人公塑造的创作中,不仅形成了跨文本之间的互文审美,还避免了“拼凑”叙事的生硬感。这是因为对互文“污染”的理解不仅需要在“一般符号学之间进行密切合作”,也要从“无意识研究(主体的错位)”^[6]之中探究。文学作品的诗意创作需要“通过多巴胺、内啡肽等愉悦物质的喷涌,来创造出真实而强烈的感受和记忆”^[7],以此激发创作的语言符号呈现,而这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实现欲望激发下的创作,也就导致了“主体的观念不断被质疑,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突显”^[2]。因此,只有“将说话的身体带回到话语中”^[8],才能够实现在身体欲望驱动下的互文性不懈重构。

具身参与和情感激发下的符号重构也并不意味着语言秩序的随意性。长期以来,关于语言秩序的解构与重构的问题和实践受到了作家们和文学批评家们的关注。王蒙就曾拆解了《锦瑟》中的字、词,将其重构为:“锦瑟蝴蝶已惘然,无端珠玉成华弦。庄生追忆春心泪,望帝迷托晓梦烟。日有一弦生一柱,当时沧海五十年。月明可待蓝田暖,只是此情思杜鹃。”^[9]仅此28字的诗句,在固定化的重构语言中,虽然整体“仍然可读,仍然美”,但不免“略有牵强”,并且也只是“大致保留了原貌”^[10]。王蒙这种对诗歌语序的简单重构并不能够使得作品达到原有的美感,而没有通过作家诗意选择的其他语序将更无法呈现出诗意的价值。萨波塔(Marc Saporta)的实验性小说作品《第一号作品》(*Composition*

No.1)则是从更高的文本故事层面重构探索了语言秩序的非权威性。《第一号作品》实验得以成功的原因在于小说的“叙述都是人物研究,而不是专注于情节的研究,无论事件的顺序如何”^[11]都不会影响人物的描述方式,由此能够因“扑克牌”式的阅读秩序自由带给读者新奇的阅读体验。但如果故事的叙事不再是《第一号作品》中单一的现在时态,各部分故事之间的关联性和时序性凸显后就无法获得同样的效果。因此,无论是字、词的简单语序重构还是故事内容的任意排序,如果没有情感激发和必要的语序依托,都无法实现作品的文学性。以 Deepseek-R1 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是基于这种符号的重复模式,即使能够参与到网络文学创作中,但生成出来的文本还是“缺少了文学最重要的自我风格和情感认知,它所做的只是已有文字和故事的堆砌和变形”^[12]。这意味着艺术的创作并不是像 Deepseek-R1 大模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的“词语、意象和其他元素的简单组合,(作品)其中存在着可以被感知到的符合人类心理逻辑和语法规则的审美情感”^[13]。文学艺术的互文性不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拼接,而语言秩序的非权威性只能表明语序的不唯一性,并不意味着语言秩序的随意性。因为这种语序的重构只是符号能指体系内部的秩序打破,所以无法跨越能指体系在所指层面建构起新的秩序。然而,互文“污染”的文学性是要在“一个能指体系向另一个能指体系的过渡”^{[4](60)}中实现艺术审美的价值表达。网络文学的“污染”创作则完全不同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探索写作的简单语序调整模式,多采用了对传统文化元素和经典作品情节的再塑造,并在很大程度切合了故事发展的基本逻辑。例如,今何在的《悟空传》巧妙化用了《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但不同于原著中的线性叙事模式,频繁使用插叙打破了既有文本符号的秩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真假美猴王”的情节中,插叙了“悟空寻师问道”“金蝉子转世”“卷帘大将被贬”等内容,这完全颠覆了《西游记》的故事出场的顺序,但作品还是遵循了事件主体之间的前后逻辑关系,也巧妙通过这些故事的关联推动了人物内心的丰富活动。网络文学作品中这种通过过往文本符号所指在能指体系中的关系重构,使得“污染”的符号不仅建立起文本间的强关联,还将文本所指的改变成为自然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形成了独特的叙事体验。

网络文学在互联网媒介环境中打破传统文学艺术叙事的同时也形成了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叙事,并展现出了一类动态的“污染”互文模式,即在既有类型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改造和混合各种元素,形成新的叙事效果。这种污染同样并非对类型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符号之间相互渗透和叠加的过程,使得类型文在细节上显得更加复杂与丰富。类型化文本中的符号被赋予了新语境下的独特指涉,且与同类文本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性关联,从而生成一种连续且递进的叙事网络。这种叙事网络使得文本在类型间彼此相互影响、重构,在此过程中,文本内含的符号彼此“污染”,形成跨越类型边界的创新空间。例如,架空和历史类型的网络文学作品通过历史时空背景的设定“使当下情景与过去的时空连接起来”^[14],融入传统文学的经典母题与叙事符号,以重复为基础形成了具有艺术张力的“污染”艺术形式。这些作品中的英雄救美、复仇、正邪对立等母题被大量应用,却不再简单等同于传统文学类型中“正义”的符号象征,而是被引入对现代情感、伦理与价值观的反思,从而产生新旧符号之间的张力,形成一种传统价值与当代情绪共同“污染”下的艺术形态特征。例如,猫腻的《庆余年》就将传统“宫廷权谋”与“武侠奇遇”相结合,承袭了传统的权谋斗争模式和“家族背景秘密”的叙事套路,但作品吸收了大量网络文学特有的幽默讽刺风格以及当代对传统封建历史不平等的批判解读,在权谋叙事中增添了喜剧和虚构的现代性符号。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并非意味着套路的固定化和单一化,相反,随着系统流、无限流、稳健流、灵气复苏流等新类型的诞生,也“意味着网络类型小说不仅在汲取文学传统时对自身进行改造,而且还在内部不断分蘖、自反、进化和变异”^[15]。当“反套路”网络文学作品形成了一种“后类型化”的网络文学作品类型,“网络文学类型化的边界变得模糊”^[16],并因此又形成了新的类型界限。这些网络文学类型的形成变化也正是网络文学创作的动态“污染”互文表现,在套路化、反套路化、反“反套路”化的过程中推动了网络文学叙事模式的演进。

因此,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创作只是将爽感的写作成为一种模式,但这些模式的“跟进者未必只是模仿,很可能同时也在创造”^[17],他们通过叙事变奏和符号重组,将这些符号带入了网络文本的开放场域,使之在新的语境中与当下的文化需求相融,达到对经典主题的动态“污染”重构。文本互动中形成的新语境叙述带有的不确定性和异质性意味着既有规则的断裂,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会生成新的文化意义,从而推动网络文学的发展,也表明了互文的动态性不只是文本内部的符号重构,更大的价值在于其深层次从语言结构对能指和所指架构关系的突破。

二、网络文学符号“污染”的艺术审美

克里斯蒂娃早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就已经表达了“单词和表达的简单重复并不能等同于这种感染力(主体、情感等内驱力引爆所带来的)”^{[4](103)},而网络文学表现出的“污染”互文艺术创作和简单机械重复的差异性则更加印证了符号秩序的重要性。克里斯蒂娃一直强调重构和理解过去经历的“重复”行为,坚持避免带来一种“分析经验和文学经验以不同的方式由简单的回忆组成,简单地重复已经采取的行动”^[18]的误解,认为“讲述重复运作的文学叙事必然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叙述”^[19]。她对待文本互动的态度始终不限于符号的简单再现,而是强调生成过程中所起到的裂变和更新的作用,看到了“有一个必要的重复……制造裂隙、破裂和更新的潜力”^[20]。这从很大程度上表明“重复”并非都是必要的,在“污染”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非必要的重复”。网络文学的创作也面临着部分作品存在着“非必要的重复”现象,通过简单的模仿或表面上的复现将传统文本符号或者当下流行“梗文化”符号生硬凑到文本中,缺乏对原有文本的深层理解,导致内容的单调和肤浅。这种重复不仅不能带来新的价值,反而可能使作品失去其独特性。特别是当生成式人工智能遵循计算法则进行符号能指的形式重复,导致了符号结构的僵化和文本内容的局限性,使得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交互主体性潜能”^[21]受到抑制。因此,网络文学的“污染”互文创作是实现文化和文本对话、深化主题内涵和创新表达方式的关键。这种模式能够让作品与传统文本进行互动,也可以巧妙通过反思性地对待重复,形成一种具有层次感和深度的“污染”现象,使得网络文学能够在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网络文学并不是独立于传统文学作品的全新文学,而是“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抽枝拔节”^[22]发展而成的,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符号文本的影响。网络文学与传统文本符号的“污染”互动对话使得类型化创作和跨媒介产业发展都“蕴含着鲜明的传统文化元素,其影响力逐渐扩大”^[23],也表现出了文本的“污染”对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价值传递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实践中看,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作品将传统文化融入内容创作中,并使得这些元素在新的叙事语境中获得不同的阐释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网络文学在传统文化“污染”对话中的互文创作也能够在增强文化的层次感中提升丰富对文本的理解视角。《十日终焉》的游戏设定蕴藏了传统生肖符号元素与意义,作品中龙类掌管的游戏是人性与死亡,核心是阴与阳的平衡;猴类掌管的游戏是以头脑风暴为主的智慧测试,关键在于智力的比拼对决,猪类代表无脑思考,鼠类对应搜寻,兔类对应逃脱,虎类对应力量,马类对应竞速等,都表现出了在意义层面的传统文化互文“污染”。这种设定模式并不是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生硬借用,而是基于故事叙述的需求,使传统文本的意义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一环。网络文学汲取传统文化意蕴使其审美受到互文的“污染”并不是单一元素的插入,而是将文学美的价值融入作品之中。这种承袭传统文学审美价值的“污染”既是文本意义层面的重复,也是传统意义赋予新文本的创新。克里斯蒂娃认为传递意义的生成阶段中,符号“在诗意语言中一切皆有可能,那么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只能相对于由言语逻辑所确立的‘正常性’来解读”^[24],而不是随意的重组。人工智能的创作却无法直接实

现这种意义的统一, 对于“重新思考作者身份在大语言模型时代的必要(而言)……语言模型交互操作链的末端仍是作者”^[25]。作为第一部与人类作品共同参赛并获奖的作品,《机忆之地》在内容生成过程中也是依靠团队成员根据内容不断提示和修正,在不连续对话和反复生成的调适中才最终成型。巴乔尔(Hannes Bajohr)运用了多种数字化写作技术,通过对卡夫卡小说等作品的处理和重新编排,创作了 *Halbzeug. Textverarbeitung*^①一书,表明机器生成文学的广阔前景。但也如他在书名“半成品”中的隐喻那样,数字时代的图像、电影、声音、文字都只是半成品和预制的材料,是将“作品融入无尽的文本中”^[26]的元素。因此,必要的“污染”意味着文化符号来源于既往文本,但意义则是需要保证在当下文本中的内容和形式统一,以此达到作品形式美和内容美的审美统一和价值表达。

网络文学以“爽感”为特征的内容风格和高互动性的创作模式使得作者在创作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络媒介文化环境的影响。“梗”作为一种“滑稽、有趣的情节或结构的语意片段”^[27]也被网络文学作家们青睐,以“造梗”“玩梗”“融梗”等形式被吸收“污染”到网络文学作品之中。阅文集团作为以数字阅读为基础的文化产业集团,最早推出了网络文学领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并独立部署接入了 Deepseek-R1 大模型,为创作提供了智能辅助。但在此之中,同样面临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把控网文的节奏、读者的爽点”^[28]的困境,如果对“梗”文化过度追求、简单挪用,将表现出非必要性的“污染”。当“梗”大量堆砌到网络文学作品之中,作品的创作就成为一种无须深思的快捷表达。这种创作方式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注意力,但削弱了作品的叙事完整性和艺术价值。克里斯蒂娃将简单的重复看作是“堵塞的重复……存在于时间之外(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波动)”^[29],缺乏透视或持续性,是一种在无法表达之时提供“间接的、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因此,当“梗”没有通过对文化符号的反思性重复来重构意义,而是以一种机械化的方式将符号嵌入叙事之时,这种重叠就会超过了叙事本身的承载能力,不仅没有推动叙事的展开,还造成了“完整的叙事节奏却被这些杂乱穿插的梗打乱”^[30],使得“梗”沦为一种浅表化的趣味元素,既无法提升作品的整体品质,也会导致作品的整体性和故事张力大打折扣,让读者感到爽感与内容的割裂。这种对“梗”文化的过度追求和简单挪用,显然是一种非必要性的“污染”。“梗”文化作为互文“污染”的一种形式,只有在具备反思性和创造性意义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文本的一部分,为作品增添内涵和层次。克里斯蒂娃将文本化的实践看作是“任何在现象文本(无论是其能指还是所指)各个层面上实现符号系统生成过程的有意义实践”^{[1](220)}。因此,真正必要互文性的“污染”就不只是文化符号和既往文本的互动,更重要在于符号意义在文本内部的互动,对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和独特表达,而不是将其简单转化为创作中的快餐化内容。只有如此,网络文学才能在符号交织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摆脱简单化叙事的局限,形成更为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网络文学创作中对“梗”的滥用和浅表化表达也正是造成“融梗”一词陷入污名化困境的重要原因。“融梗”的行为实质是“在作品人物设定、故事套路等方面借用他人智力成果的行为”^[31],但现在则多被看作是洗稿和山寨等词相同行为的“不同称谓,是基于所使用领域的不同而使用的不同词汇”^[32],将其视为一种抄袭的行为。这都反映出如果“梗”的使用仅仅停留在浅表层面,缺乏对文化符号深层次的挖掘与创造性改造,就会使得“梗”成为非必要性的“污染”重复,从而导致内容失去了丰富性和可持续吸引力。部分网络文学作品以“XX 崛起系统”或“XX 重生之全能天才”等类型为模板,利用已经被广泛消费的“系统梗”“重生梗”作为核心叙事,用“开局就无敌”“主角光环无限大”的套路吸引读者,虽然初期确实能带来一时的爽感体验,但缺乏深入的情节逻辑和世界观构建以及对经典“梗”的简单挪用,使得故事情节发展极为扁平化,不仅难以持续抓住读者,还可能涉及侵权行为。因此,必要的“污染”应该是对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和独特表达,而不是将其简单转化为创作中的快餐化内容。晨星 LL 的《这游戏也太真实了》就是一部将网络流行语、玩家行为模式和梗文化成功融合到叙事中的典型网文作品。作品中的“梗”不仅作为笑点吸引读者,还恰到好处地成为

推动叙事、强化代入感的核心要素。玩家的经典语录,如“苟住,我们能赢!”“这波稳了”,不仅呼应游戏环境,还形成了特有的语言风格,强化了玩家群体的身份认同。作品通过对网络热点“梗”的自然“污染”强化了角色的塑造,既营造了轻松的氛围,也丰富了人物的语言风格。这种“梗”元素的融合不仅增强了文本趣味,也体现了必要的“污染”在创作中的逻辑价值。

三、网络文学跨媒介符号流动的意义重构

网络文学在互联网媒介中并不单独表现出文学文本的作品形式,“通常会采用互文式的叙事方式,形成主文本和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现象”^[33],以实现跨媒介文化符号的“污染”互文。克里斯蒂娃早期提出互文性理论时就拓展了传统“文本”的定义,突破了过往文字符号与意义所指对应关系的理解,从符号的矩阵(the matrix of the sign)视角将符号意义的动态化看作是“意义多样化模式赋予的可移动‘主体’”^[34],也契合了网络文学跨媒介文本叙事的动态交互。网络文学的跨媒介文化符号“污染”是文学叙事与多种媒介形态的深度融合,以“IP”为“不同媒介载体中的网络文学文本之间的联系符号”^[35]产生了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网络文学的跨媒介符号“污染”不仅拓宽了文本的意义边界,也在创作中构成了对文本符号的再生产,推动了网络文学作品跨媒介符号的“污染”流动。

网络文学在数字化媒介平台中“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多元化的IP衍生运营模式”^[36],这种模式下的跨媒介改编因为文化符号体系差异性而不同于文字符号内部的互文性“污染”,更明显表现为以作品的故事及人物特质等深层意义维度的符号互动。虽然跨媒介语言符号在转化中发生了变化,但“‘文质兼美’的艺术精品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审美理想与美学追求”^[37]。故事结构和人物特质的连续性成为连接各媒介形式的核心纽带,从而推动了“污染”从单纯的符号表面走向意义深度上的交互与融合。当前,网络文学的文本内容与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等媒介形式深度融合。虽然网络文学中的符号体系被重新定义并置于新的文化语境之中,但不同的叙事符号却也能“让人一看就能够辨认出这些作品都属于同一虚构框架”^{[38](113)},这是因为故事结构和人物特质的连续性成为连接各媒介形式的核心纽带,从而推动了“污染”从单纯的符号表面走向意义深度上的交互与融合。例如,阿耐的网络文学作品《欢乐颂》被改编为影视剧后热度持续,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作品改编的成功。虽然系列影视剧在叙事语言、场景设计和情感张力表达上与小说文本存在显著差异,但观众仍能迅速地将这些角色及其故事关联到原著文本中。其中,安迪的理性与冷静在原著中多是以心理活动和对话展现,而在影视剧中则能够通过演员的冷峻面容、简约的服饰与独立的空间场景强化性格特质,凸显人物个性。在网络文学的影视剧改编中,意义从文字符号系统到音视频更加丰富的符号矩阵,印证了“文学体裁的变化都是语言结构在不同层次上的无意识外部化”^{[1](93-94)},即通过媒介形式的重构,使文本中的潜在意义在新语境中被重新塑造和传递。再如,完美世界根据萧鼎的《诛仙》开发了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以原著的世界观为基础,重现河阳城、青云山等场景,并引入碧瑶、张小凡等原著角色,通过动态视觉效果、背景音乐和即时反馈的任务机制,为游戏符号的叙事增加了参与感和沉浸感。这种符号系统超越了文本的线性叙述,不仅使原著中内隐的叙事特质与人物形象获得直观呈现,还通过新的符号体系强化或调整了这些意义的传播方式。

这种在符号层的意义流通形式,恰恰是人工智能基于符号体系与意义的对应关系生成作品的优势所在。因为网络文学符号意义的跨媒介流动既是对原著的再创造,也为文化文本在多维空间中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而作为一种让意义在不同媒介符号矩阵中流动的形式,这一过程则较少涉及符号意义本身的变动。因此,当符号互动中新的意义生成不再成为必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凸显出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只需要实现在媒介叙事体系之间的符号传递中通过叙事媒介传递原文本中的所指,就能

实现跨媒介符号矩阵的意义联系。例如,“文生图”三代模型 DALL·E 和“文生视频”模型 Sora AI 已经能够将跨媒介语言的转化时间成本极度压缩,并呈现了相对较高质量的内容输出。同样,Deepseek-R1 也能够通过接入视频制作软件或者代码传输等形式,实现更高效的内容改编。特别是在跨语言文化的翻译中,由于意义和符号的关系是相对固定的,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更稳定的模式实现意义的跨越,从而以“本地化调节功能帮助网络文学作品文化适配度提升”^[39]。未来网络文学的全产业发展正可以借助这种技术优势,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文学文本转化为剧本、动画脚本、游戏情节设计,甚至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生成配音脚本或字幕内容。这种转换不仅提高了内容生产效率,还能确保跨媒介语言表达的一致性,减少了传统跨媒介改编中可能出现的失真现象。这种叙事符号在不同媒介形式间的“意义迁移”,也表明故事内核和叙事特质在跨媒介污染中成为连接多种文化形式的关键纽带,从而能够进一步推动网络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深度发展。

网络文学的跨媒介“污染”也是一种在艺术改编中的文学再创作,受到关注的多是书写的新文本,即改编后的新艺术形式。而文本交互关系“所包含的可能的开放性揭示了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审视文本的可能性”^[40],这也意味着网络文学的跨媒介符号互动不是单向度对新文本的符号意义影响,同样也包含着新符号系统对原有文本产生互动“污染”的可能。网络文学“IP”改编后的新符号体系在创造新叙事文本的同时,也会在情节、人物和主题等维度“污染”原著语义的边界,甚至对其叙事潜力和符号意义产生新的延伸。虽然影视剧的改编通常被认为是以文学为蓝本,但网络文学的改编也带动了原有网络文学文本的“再创作”,从而使影视剧反过来成为网络文学的一种“污染”力量。例如,在白羽摘雕弓的《黑莲花攻略手册》原著中并没有对主角凌妙妙穿书后的家人细节进行描述,但在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永夜星河》中,通过穿书前遗像和穿书后父亲见面的场景塑造了现实与虚拟世界主角父亲相同的情节设定。这一设定不仅通过视频符号叙事语言巧妙表达,为原著的故事叙事逻辑和情感塑造进行了细节补充,还让观众在“穿书”设定下对角色的情感选择有了更充分的理解依据,同时也使父女关系的情感张力进一步具体化。这种跨媒介文本改编不仅丰富了影视符号系统的表现力,也形成了对原著文本的互动“污染”,进一步强化塑造了既往文本的情节逻辑与主题深度。因此,在改编过程中,影视剧、动漫等媒介形式往往会对原有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构,这种重构正是在符号系统转换的过程中通过新符号的注入与叙事调整,丰富和扩展了原有的意义空间。这种文本的互动与“污染”并非仅仅是对符号的表面改写,而是通过不同媒介形式对文本潜在意义的再创造。这一过程中,叙事需要“始终要关注到文本所要传达和表现出的主题、哲思与诗意及其对表现媒介的影响”^[41],才会使得原著中的某些潜在情节或情感张力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与外化,尤其是在视觉化的呈现下,原著未曾明确表述的细节和关系得以具象化,从而增强了原文本的情感共鸣和叙事的合理性。

网络文学的跨媒介“污染”不需要过多的文本互动的新意义生成,但并不意味着符号系统的意义重叠。网络文学艺术书写新文本的重要性使得再创作的意义占据主导,因此网络文学数字化媒介符号间的互动也表现出了跨媒介“污染”叙事的动态机制,特别是叙事内容实现了符号体系的双向渗透。由于当“一个跨媒体故事通过多种媒体平台展现,其中每一个新的文本都对整体故事做出了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38](95-96)},网络文学改编作品也对原著拥有着同样的“污染”力量。读者与观众在接受影视剧作品后,重新回到文学文本时,往往带有强烈的视觉化预设,这种预设不仅体现在人物形象和场景细节的具象化,还包括叙事语调、情节节奏以及情感共鸣的转变。如电视剧《赘婿》在改编过程中,以其轻松幽默的风格和细致的画面呈现丰富了原著情节符号体系的同时,打破了作者“愤怒的香蕉”在原著中打破等级制的过程的宏大叙事和严肃批判。而剧中生活化场景和人物互动,特别是宁毅的轻松诙谐语气、“赘婿传奇”的人设和人物行为逻辑,逐渐成为读者对原著人物形象的再认知。这种符号的重新注入打破了原本小说符号系统的封闭性,将影视剧中新增的趣味元素“污染”回网络小说,引发了一种动态的互文现象。当读者在观影后重新阅读小说时,会无意识地将影视剧的情感节奏带入

文本,从而对小说原有的情感表达产生偏离。同时,网络文学作品改编在带来人物形象具象化的同时,也会因“视觉符号”的强植入性削弱文本开放性的想象空间,造成原著人物视觉形象的固定性。例如,《全职游戏》的主要情节围绕虚拟游戏《荣耀》的竞技比赛展开,其原著的符号体系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游戏的高度具象化和逻辑严密的叙述,为其网络游戏改编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基础。其后,网络游戏《全职高手》的上市将虚拟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交织,通过呈现生动形象的游戏画面和角色技能,原著中的人物形象与战斗场面等依赖读者想象的内容变得更加具体和直观。但与此同时,叶修的角色形象和战斗风格则会因游戏中明确的建模和动画呈现变得具体而单一,当读者回到原著文本时,就会不自觉地以游戏中的视觉形象为参照,从而限制了其对角色的多样化理解。原本网络文学作品中“各式各样的人设要素与世界设定要素组成的数据库,同时存在于作者和读者的脑海之中”^[42],但随着媒介形式改变带来的符号回流,具象的视觉符号重新注入到原著文本,读者视角的想象空间则被固定成单一的形式。虽然这一互动过程表现出了网络文学跨媒介叙事的开放性,但同时也使得原著文本的开放性与多重解读的可能性逐渐受到了符号互动的想象限制。

四、结语

互文性理论将符号重构和文本“污染”视为符号意义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发生机制,打破了传统语言的界限,创造出了新的表达方式和理解路径。在当前互联网媒介技术迭代及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数字符号的互文性在网络文学创作实践中得到了独特展现。网络媒介提供了更加接近于半个世纪以前克里斯蒂娃所设想的无限文本空间,使得文学创作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想象可能。特别是随着以 Deepseek-R1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实现了对文本的高效提取和快速重构,媒介技术辅助以前所未有的优势介入创作的符号重构过程中。从《第一号作品》到《半成品》再到《机忆之地》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探索创作的作品,都依然是一种实验尝试,其影响也更多是作为事件性的存在,尚未达到对传统文学创作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可能。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已经展现出无限文本海洋中符号意义生成的流动性,深刻印证了网络媒介技术能够让文本互动的“污染”形式参与到符号与结构的重构中,以及其超强的文本生成能力对创作边界的进一步突破。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仍然是在底层代码逻辑的基础上,呈现出对规则的绝对遵循特性,显示出其内容框架的重复性,最终也决定了其拼凑的创作无法摆脱算法制约,难以超越对符号简单拼接的桎梏。互文性所强调的文本非权威性也表明文本互动的形式决定了文学创作中“污染”是深层次艺术的审美呈现,而非语言秩序任意破坏下的无序拼凑。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未来创作中既拥有参与无限符号重构的巨大潜能,又更亟须人类主体参与到符义生成和流动建构的过程,规制非主体性的意义解构。

网络文学在互联网开放的符号体系中实现着文本创新和重构,也推动了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有机融合,展现出“污染”在创造性表达中的作用。这一过程不仅打破了单一文本模式的限制,还使得网络文学具备了跨媒介、跨文化的符号创新能力。一方面,网络文学创作中文本重复表现出的意义差异证明符号的复现并非都是必要。部分作品中对“梗”文化的过度追求和滥用导致了符号“污染”的浅表化,进而造成内容与文本互动的割裂。因此,这也意味着网络文学对文化符号的互动应当立足于内容创作的实际需求,在情节发展的基本逻辑中使之成为整体文本的一部分。满足爽感作为网络文学一种独特的叙事逻辑,也是无法在“梗”文化的机械重复中实现的。只有将“梗”的意义生成与文本的叙事结合,才能够在作品的阅读互动中激发读者的爽感。另一方面,文本的互动性表明了意义的流动,也证明了符号系统的对话并非是单向的。这就意味着网络文学跨媒介改编中的符号意义也是在不同文本的互动中得以实现故事整体的意义。网络文学的改编显示出新媒介在吸收作品符号意义的同时,也

在创作中赋予了文本新的内涵并将新的媒介符号矩阵中的意义传递到原著的符号体系之中。这都表明当前网络文学的发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文学创作的探索,一定程度上是对克里斯蒂娃“污染”互文性理论的独特验证,更彰显了这一理论在当代文学中的前瞻性和价值。

注释:

- ① 该书于 2018 年由柏林 Suhrkamp 出版社出版,2021 年由 Counterpath 出版社翻译成英文版,书名为 *Blanks: Word Processing*。

参考文献:

- [1] KRISTEVA J. *Sémiotiké,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M]. Paris: Seuil, 1969.
- [2] 钱翰. 在人工智能时代重申对话性与互文性概念[J]. 社会科学战线, 2024(1): 179-186, 282.
- [3] ANGELOVA E.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Fifty Years Later: New Directions in Kristeva Studie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24: 19.
- [4] KRISTEVA J.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M]. WALLER M,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5] 揭其涛, 王奕诺. 玫瑰荆棘: 生成式赋能数字出版内容生产的逻辑、机遇与隐忧[J]. 科技与出版, 2024(4): 64-70.
- [6] KRISTEVA J. *Le geste, pratique ou communication?*[J]. *Langages*(Paris), 1968, 3(10): 48-64.
- [7] 王祥. 网络文学的神奇叙事与情绪标记[J]. 中国文学批评, 2023(1): 150-159, 192.
- [8] OLIVER K. *Ethics, politics, 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s writing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3.
- [9] 赵思运. 王蒙旧体诗中的“李商隐情结”[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2(2): 91-97.
- [10] 王蒙. *双飞翼*[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23.
- [11] PFAHL C A. *Shuffling the Sjuzhet in Marc Saporta’s composition No. 1*[J]. *Critique-Bolingbroke Society*, 2015, 56(3): 330-343.
- [12] 刘鹏波. 网络作家 PK DeepSeek, 谁赢了? [N]. 文艺报, 2025-02-19: 005.
- [13] 刘鹏波. DeepSeek 强势出圈, 写诗不再神秘? [N]. 文艺报, 2025-02-19: 001.
- [14] 龙柳萍. 重复与差异的价值: 互文理论视阈下的网络类型小说[J]. 广西社会科学, 2014(2): 152-155.
- [15] 贺予飞. 网络类型小说的审美维度[J]. 文艺论坛, 2024(3): 21-29.
- [16] 李玮. 从类型化到“后类型化”: 论近年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新变(2018—2022)[J]. 文艺研究, 2023(7): 85-96.
- [17] 邵燕君. 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9(2): 1-18.
- [18] KRISTEVA, J. *The sense and non-sense of revolt: The powers and limits of psychoanalysis*[M]. HERMAN J,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50.
- [19] KRISTEVA, J. *Roudiez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M]. LEON S,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24.
- [20] KRISTEVA, J. *Revolt, She Said*[M]. O’KEEFFE B,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85.
- [21] 庞弘. 论文学阐释的交互主体性之维[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2): 191-199.
- [22] 张斯琦. 中国传统与时代烙印: 网络文学叙事模式的继承与新变[J]. 当代作家评论, 2022(6): 12-22.
- [23] 王婉波. 论中国网络文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面向及实践路径[J]. 文学评论, 2023(6): 82-90.
- [24] KRISTEVA, J. *Poésie et négativité*[J]. *L’Homme*, 1968, 8(2): 33-63.
- [25] BAJOHR H. *Writing at a Distance: Some notes on authorship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German Studies Review*, 2024, 47(2): 315-337.
- [26] VOIGTS E, AUER R.M, ELFLEIN D, KUNAS S, RÖHNERT J AND SEELINGER 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telligent art: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and creative practice*[M].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24: 21.
- [27] 胡兵, 张静文. 模因论视阈下“梗”的生成与传播研究[J]. 当代传播, 2022(2): 93-96.
- [28] 莫斯其格. 网文领域率先部署 DeepSeek 阅文集团邀作家探索 AI 赋能创作[N]. 广州日报, 2025-2-15: A8.
- [29] KRISTEVA J. *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246.

- [30] 常保青, 陈海燕. 《山海经之再见怪兽》: 中国文化经典的多维重构与符号杂糅[J]. 电影文学, 2023(5): 158-162.
- [31] 储卉娟. “融梗”怎么看: 既要秩序, 也要活力[N]. 人民日报, 2019-12-06: 20.
- [32] 桂栗丽. 文学作品中“融梗”行为的合理边界[J]. 出版发行研究, 2022(7): 62-68.
- [33] 黄玲, 王乃璇, 程砾瑶. 网络文学跨媒介叙事: 后经典叙事时代的液态文学及叙事特征[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4): 83-87.
- [34] KRISTEVA, J. The semiotic activity[J]. Screen (London), 1973, 14(1/2): 25-39.
- [35] 禹建湘, 张浩翔. 人工智能文本生成对网络文艺发展的赋能[J]. 江西社会科学, 2024, 44(6): 64-71.
- [36] 徐立萍, 赖雅婷. 网络文学IP开发: 从“网文”到“网文+”[J]. 出版广角, 2024(16): 69-74.
- [37] 聂茂, 付慧青. 王船山诗学思想与网络文艺的文艺性再造[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7(6): 177-187.
- [38] JENKINS H.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 [39] 李玮. AI翻译、短剧开发、嵌入文旅: 网络文学出圈更出彩[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5-2-19: 007.
- [40] LUSIA, A. Text/texts: Interrogating Julia Kristeva's concept of intertextuality [J]. Semiotica, 2022, 240(3): 45-67.
- [41] 朱怡淼. 本体溯源、境遇生成与价值重构: 玄幻类网文影视改编经典化的三重维度[J]. 当代电影, 2024(7): 96-103.
- [42] 王玉王. 游戏化向度的“爱女文学”与设定中的“公意争夺战”[J]. 中国图书评论, 2024(7): 32-44.

Intertextual “contamination” in the symbolic reconstruction of online literature: The symbolic landscape half a century after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YU Jianxiang¹, ZHANG Haoxiang^{1,2}

(1. School of Humanit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2. School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Societies, University of Leeds, Leeds LS2 9JT, UK)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Julia Kristeva's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half a century ago, texts have continuously transcended their own boundarie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flow of signs. With the evolving iterations of internet media, online literature has enabled rapid interaction of signs within a more open textual space. Especially since the advent of GAI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infinite landscape of symbols has emerged, attesting to the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textual “contamination” of texts. In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Kristeva envisions intertextual “contamination” as a reconstruction of signs that opposes the notion of “purity” and absolute authority. This vision emphasizes the dialogic nature of symbolic meanings within the text. On the one hand, the “contamination” based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xtual symbols allows for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between AI-generated content and human creativity. This highlights how the fluidity of intertextuality may result in a mechanically repetitive dialogue. The simplistic “juxtaposition” of linguistic signs fails to achieve the aesthetic resonance inherent in the symbolic reconstruction process, revealing a stark contrast in the beauty manifested by these two modes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Kristeva also presciently proposed the idea of “necessary repetition.” This necessity offers a paradigm for the aesthetic intertextuality in online literary creation. It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active symbols is not unidirectional; rather, the symbolic matrices of old and new texts form new associations between signifiers and the signified. This process generates novel symbolic meanings within the integrated stories across various media, further ext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text.

Key words: online literature; intertextuality; Julia Kristeva; semiotics; GAI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编辑: 陈一奔]